

執筆之時，美國警方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進行清場，數以百計的示威者被捕、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84歲的老婦被噴胡椒噴霧。轉瞬間運動進入十字路口，誰也不曉得運動最終會鬱鬱而終，還是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新突破。

地球的另一邊，「佔領中環」的示威者繼續聚集於匯豐總行地下，繼續舉辦不同的活動，不斷進行有關資本主義及另類生活方式的討論。最近民主派於區議會大敗，特首選舉即將展開，亦令「佔領中環」運動淡出了主流媒體的鎂光燈下。

民主派於區選大敗後，不少朋友在討論民主運動該何去何從，彷彿天真的要塌下來了，黑夜降臨，我們卻無法反應過來。誠然，對於我這類不太信任議會政治的人，看見民主派慘敗也頓感神傷。不是因為輸掉多少議席的利害考慮，而是「眼白白」看見不少香港人的短視，投票取向考慮「蛇齋餅粽」多於議員的視野和立場，這點最令人痛心。

民主陣痛難以立時消除，惟有拿起書來從文字尋找啟示，隨手翻起川本三郎撰寫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川本三郎是日本知名評論家，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學運風起雲湧時剛剛從東京大學畢業，旋即進入朝日新聞社工作，在前線採訪多場日本學運。當年的記者同情學運，甚至以採訪車替抗爭者偷運物資。這本書是一部記錄著他當時內心掙扎的散文集。他既是記者，站在旁觀的角度，把學運化作文字；但記者的旁觀角色卻令同情學生的「自己」感覺混淆。書中他不斷向自己提問：究竟作為旁觀者的自己意義何在？

故事的轉折，是他在1972年朝霞自衛官刺殺事件中為犯人湮滅證據，最終被判十個月徒刑，緩刑兩年，並失掉記者職務，最後走上自由作家和評論家之路。川本三郎為殺人犯湮滅證據一事備受爭議，而他亦希望藉此書坦承交待事情始末及自己的悔疚。但對我來說，本書最吸引的地方還是讓我們更了解日本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社會面貌，並看見日本進入消費娛樂文化當道的年代之前，曾經對社會公義有著非一般的堅持與執著。而川本三郎對自我身分的掙扎，或多或少撼動了我的心扉。或許他身處的世代與今天香港的背景不一樣，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見不公義的事情，是如何回應（或不回應）？我們會否也成為制度暴力的幫兇？

每次被問及民主路如何走下去的問題，我也是給出一個同樣的答案，那就是選舉的勝負對於民主運動並非最重要，年青人投身社會運動也不僅限於當區議員或地區幹事。最重要是，我們作為公民（citizen）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領域有沒有進行民主的實踐，對於社會的不公是否視而不見？舉例說，假若你是教師，可否利用課堂的空間，盡量令學生明白民主、自由、人權的重要性？如果你任職商業機構，會否因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市民」、「打工仔」，而選擇對社會議題不聞不問？

政府的制度暴力往往在普遍市民的冷漠下更肆無忌憚地張牙舞爪。因此，我們必須自省會否對社會議題不聞不問，甚至主動在自己的生活領域把關懷社會的意識與我們的鄰舍分享，讓每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公民責任，不僅是在四年一度的選舉投票，而是時刻關注城市裡的不公義。我們不用所有人都是行動者，但必須培養大眾成為具人權意識的公民，並且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失去價值判斷的能力。這樣，社會才能真正走向公義，制度暴力才不致繼續無限擴張！📌

民主，在於公民的覺醒與自省

